

古巴的困境與危機

劉天均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 言

共產主義(或稱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經過一個多世紀的鼓吹與宣傳，半個多世紀以上的實踐，終於在「實踐檢驗真理」的嚴峻考驗下，宣告失敗了。今後，它將被迫完全退出世界政治舞台，甚至會被人類丟進歷史的灰燼裏。現在只有少數幾個共產黨政權仍在堅持社會主義的信仰，與時代潮流相頑抗，並在困頓的環境中掙扎，其中之一便是位於西半球加勒比海中的「社會主義孤兒」——古巴。

古巴，近年來在東歐共產黨集團(包括蘇聯在內)紛紛「非共化」浪潮的沖激下，已陷於多重的危機，如意識形態危機、社會危機、經濟危機、安全危機以及一黨領導危機等。在上述之重重危機緊迫下，卡斯楚自一九八九年秋迄今曾多次向古巴人民強調的宣示：無論國際局勢如何詭譎多變，今日的古巴只有一個選擇——「社會主義或死亡」(Socialismo o muerte)。目前，這句旨在傳達誓死捍衛社會主義決心和趁機喚起全民憂患意識的口號，不料竟成爲古巴人民藉以表達萬般無奈及灰心失望的心聲(在極權統治下的社會裏，危機意識所能產生的心理效應，往往是利弊互見的。其利在凝聚全民的共識，以抗危機；其弊則可能因強調憂患或危機意識而導致另一項更爲嚴重的危機——信心危機。①)

爲了反制共產黨集團巨變對古共政權所造成的「蘇東波」效應，以及適時應付內部日趨緊迫的危機局面，卡斯楚領導階層除在黨、政、軍、經、社各方面採取了系列的應變之具體措施外，也在維護其社會主義體制、社會主義革命目標、國家安全與民族尊嚴：等方面，提出了一套頗爲響亮而動聽的宣傳口號，和一套「似是而非」的詭辯理論——辯證邏輯，企圖藉此以強化其合法統治及沖淡人民的失望情緒。

註① 當卡斯楚的宣示性口號成爲哈瓦那革命廣場的巨幅標語時，內心不滿的古巴人民便在「社會主義或死亡」的下方寫上「二者有何不同」的字樣。見Francis-

co de Andres, "Cuba Reinvents the Salsa Without Seasoning," ABC, Madrid, May 7, 1991;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13, 1992, p. 11.

本文擬就古巴當前所面臨之重重危機及舉國上下為應付或處理各項危機而形成之危機或憂患意識，作一綜合性之分析於下：

二、意識形態危機

世人皆知，凡一個共黨組織，在其進行建黨、革命奪權及專政的過程中，慣將意識形態作為其排除異己、鞏固政權或塑造合法統治以及處理危機時之有利政治工具。因此，意識形態便在共黨政權統治運作中，扮演著一個極為重要的前衛角色。

意識形態雖屬社會之上層建築，且是形而上的唯心事務，但却為崇奉唯物主義的共黨所特別重視。因為共產政權所實施的威權統治，不僅須用一套有形的政治工具，而且更須依靠一套共同的政治符號和統一的政治信念。而意識形態既是支持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的理念基礎，又是建立社會主義體制及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之心理基礎，故一旦基礎出現裂縫或發生動搖，則全民的共信與共識便立即呈現危機——意識形態危機。

故當東歐變天、蘇聯分崩離析、華約解體（一九九一年二月）、「經互會」告終（一九九一年六月），以及蘇聯「八月政變」落幕和蘇聯終於一九九一年底正式宣佈瓦解並自次年初成立一個新的聯合體——「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CIS）時，古共政權便遭受著一波又一波的外來衝擊，幾乎被推上搖搖欲墜的邊緣；其次，這一連串的戲劇性巨變，對卡斯特個人晚年的政治生涯言，不僅自覺命運多舛，更有「朝來寒雨晚來風」的不勝唏噓之感，這對當年曾是一度叱吒風雲的「國際遊俠」卡斯特，何止是一記教訓而已。

近年來，身處「四面楚歌」的古共當局，已動員其全部宣傳機器和新聞媒體，向全國人民反覆宣示：無論蘇聯及東歐各國的局勢如何詭譎多變，無論北鄰的美帝國主義如何囂張跋扈的對古巴加以孤立或採取軍事威脅，②縱令全島四周正被資本主義海洋所圍繞著，③古巴仍將誓死堅持其社會主義革命大業。

尤當蘇聯「八月政變」奪權失敗而親古之保守勢力完全被戈巴契夫及葉爾欽聯合清除出局時，④古巴共黨機關報「格琅

註② 美國曾於一九九〇年五月初在古巴外海進行過一次大規模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演習，向古巴展現其軍事威力，而古巴則立即動員五十萬民兵及後備役，投入

「古巴之盾」的防衛演習以對抗之。

註③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 16, 1991, p. 3.

註④ 在蘇聯保守勢力中的高級軍事將領與情報人員，如當時之國防部長雅佐夫及 KGB 要員雷奧諾夫（N. S. Leonov）等，均主張與古維持盟友關係及繼續提供軍事援助。請參 Christopher Andrew, *KGB: The Inside Story of Its Foreign Operations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0), p. 466.

瑪」便於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的社論中強調重申卡斯楚在去年「七·二六運動」大會向哈瓦那革命廣場群眾所發表之演說：無論蘇聯政局如何演變，無論社會主義集團是否解體，古巴絕不會脫離由自己所選擇之革命道路，並將堅持社會主義建設目標。^⑤

至一九九一年九月中旬，當蘇聯片面宣佈將自古巴撤出全部駐軍時，^⑥古巴全國立即驚慌失措，除透過媒體呼籲軍民須「處變不驚」外，並令外交部門發表聲明，指責蘇聯的舉措不當，完全違背當年蘇古所達成之駐軍協定。^⑦此一突如其來的消息，在古巴人民心目中所引發的震撼，當不亞於一九六二年十月的「古巴危機」。

今從古巴當局的危機反應模式，以及上述各項文宣內容與相關之政治口號中，吾人當可清楚看出，在東歐「非共化」與蘇聯巨變的衝擊下，古巴社會已存在著頗為嚴重的意識形態危機——對社會主義革命本質與目標的徬徨與質疑。

三、社會危機

古共政權如其他極權國家一樣，其政治體制的穩固與統治機器的運作，不是建立於政權之合法性和全民付託或經被治者同意之民意基礎上，乃是靠著領袖人物的傳奇魅力、威權統治、絕對忠誠和整套強固而綿密的社會監控體系。從古共政權的統治結構中，高踞社會金字塔上層的黨、政、軍三股力量，環環相扣的形成一部絕對嚴密而專斷的統制主體，在其最高領袖（Ilder maximo）卡斯楚領導下，實施由上而下的一條鞭式的威權統治。在社會下層的群眾基礎面則建立起一道遍佈於全國每個角落的網狀監控體系——「革命保衛委員會」（CDR）及其周邊組織如「街坊委員會」、「快速行動特遣隊」等，^⑧以及其他專業人民團體如「全國小農協會」、「農民警戒分遣隊」、「婦女聯盟」與學生組織，在「內政部」的監督下，對人

註⑤ *Granma*, Aug. 29, 1991, p. 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Oct. 22, 1990, pp. 211 ~ 212.

註⑥ 當美國國務卿貝克於一九九一年八月上旬訪問莫斯科時，戈巴契夫為了爭取美國的經濟援助，在八月十一日向新聞界宣稱：蘇聯將自古巴撤出其「訓練旅」一萬一千人（戈某當時所稱之人數過高，據西方情報資料顯示，共約六、八〇〇至七、一〇〇人，其中含戰鬥部隊二、六〇〇、二、九〇〇人，軍事情報人員約二、〇〇〇人，另有軍事顧問與技術人員約二、二〇〇人。見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 12, 1991, p. 1.

註⑦ 古巴外交部聲明指出：根據蘇古雙邊條約之規定，蘇聯宣佈片自古撤軍，應屬「行為不當」。而且蘇聯未能主張美軍應同時相對自古巴的關塔納摩（Guantanamo）基地撤走其軍隊。請參 Hal Klepak, "Hard Times Ahead for Havana," *Jane's Defence Weekly*, Oct. 12, 1991; 民國八十年九月十三日「聯合報」八版。

註⑧ 「快速行動特遣隊」係由人民所組成之「義勇治安團體」，協助「內政部」維護社會治安及打擊犯罪的「特動隊」，請參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s Caribbean*, Aug. 29, 1991, p. 6.

民思想和言行加以監控，並充當黨、政機構的傳聲筒，以維護社會治安及加強人民思想教育為主要工作目標。^⑨在古共政權的高壓統治下，古巴的社會基層組織確曾在監控、保防和維持社會安定方面發揮過相當的作用。

但當革命進入八〇年代後，封閉型的古巴社會漸趨分化，如社會構成分子的年齡結構、知識程度、人生觀及價值觀等均與時俱變；因此，一般人民的革命激情漸趨降溫，對社會主義教條漸表冷漠，甚至對現存的經社制度、價值體系、公共政策乃至卡斯基的威權領導方式和決策能力等，一併表示質疑。

及至東歐巨變對古巴產生嚴重衝擊時，除異議人士外，一般知識分子及黨政中級幹部主張大幅變革者不乏其人，^⑩甚至私下指出：古巴的革命方向一開始便步入歧途，將國家民族帶進一條失去選擇機會的不歸路，雖然在以往三十多年的「革命過程中」，曾獲得某方面的局部成就。^⑪

面對日趨昇高的不滿情緒、日益增多的冷漠群眾和主張改革的精英分子，古巴原有的社會控制體系已面臨挑戰，幾乎難以應付逐漸蛻變和逐漸脫序的社會現象，故不得不再事加強「內政部」與群眾組織對社會監控的功能，^⑫以及採取一套軟硬兼施與恩威相濟的「兩面手法」，對不滿分子和異議人士進行攏絡安撫和威脅鎮壓，以便維持表面的社會安定。

目前，向古巴社會秩序挑戰最力者共有三股力量：其一是世人盡知的人權鬥士和異議分子；其二為一般社會青年；其三則是在學的大專學生（後二者均屬二十歲左右的新生代，係在「新」社會環境中誕生和成長的「社會主義新人」）。今略析其活動概況於下：

（一）人權鬥士及異議分子：古共政權對人權鬥士及異議分子的摧殘鎮壓，雖屬司空見慣的事，惟目前出現的機率却較往常為高。在古巴境內雖有十多個人權組織，但其活動空間却相當有限，尤當東歐集團發生巨變期間，他們的每一活動均受到監控或壓制。如「古巴人權黨」曾因致函「美洲監視」及「國際特赦組織」，指控古巴政府踐踏人權及摧殘異議分子，而

註⑨ 關於古巴之社會監控體系及其活動詳情，請參 Rafael Hernandez et al.,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Cub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18, no. 2 (Spring 1991), pp. 38~54.

註⑩ 於一九九一年初逃抵西班牙的一名負責審核外資的經濟部官員 Fernando Moya 曾稱：古巴現行的政經制度與相關政策，必須加以徹底的改革。見 *Foreign Reports*, Feb 21, 1991, p. 3.

註⑪ 古共部份中高級幹部及外交人員曾私下對西方學者指出：卡斯楚在一九六〇年代初作出兩項非常不智的決定：（一）向蘇聯一面倒的外交政策；（二）未能採取適合古巴經濟條件的「混合制」。請參 Howard J. Warda, "Crises of the Castro Regime," *Problems of Communism*, Jan~April 1991, pp. 84~93.

註⑫ 卡斯楚為加強「革委會」及「街委會」的社會監控功能，乃選派其親信巴蒂蘇斯達將軍擔任「革委會」的主管，以及指定另一軍事將領充任「內政部」部長。將情治單位與民衆組織完全納入軍管體制之下，其用心何在可不言而喻了。請參 Susan Kaufman Purcell, "Cuba's Cloudy Future,"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0, pp. 122~123.

遭到報復。又如最近，由「古巴人權委員會」及「民族和解」兩個異議組織聯合其他八個同類團體，結成一個「古巴民主聚會」(Cuban Democratic Convergence)，主張在古共「四大」前召開國民制憲大會，建立多黨制，以和平方式與古共商談國是問題。但彼等部份人士立即在哈瓦那被捕，處以一至三年不等刑期。¹³。

尤自一九九一年下半年起，古巴政府頒布了一項新的治安法令，特准情治人員對任何可疑之「危害國家」人士，進行拘捕而勿須先獲司法單位之許可。¹⁴因此，獲罪繫獄的人數正日漸增加。據西方人權組織估計約三至四百人，但古巴內部異議人士透露：在全國二百多所監獄中服刑或接受改造的良心犯在千人左右。不過，古巴良心犯人數之多寡，通常會因國內政治氣候的變化情勢而定。即當古共統治者在感受威脅減輕，或認為危機趨緩時，其摧殘異己分子的黑手便會放鬆一點，允許活動的空間也會放寬一點，而牢獄中受刑的人數也會隨之減少一些。反之，若一旦安全受到威脅，危機意識便會因之升高，而懲治異己的鞭笞也就會舉得高高的，落得狠狠的，監獄中的人數也就會增多了。

(二)社會青年及大專學生：目前，約佔古巴全國人口五分之一強的青年人口，是吃社會主義奶水長大的「新古巴人」。他們既接受過共黨的栽培與教育，理應是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擁護者，但實際情形並非如此，他們多數不僅對充滿激情的革命口號和政治教條表示厭惡，而且對現實種種（如工作環境、生活條件、薪資所得、個人前途……等）頗表不耐及不滿，甚至對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政經制度表示高度的興趣。¹⁵其中尤以在學的大專生所表現者較為強烈，如最近曾以攻擊古共一黨專政和卡斯楚個人獨裁為主題之各校串連活動，已引起古巴政府的嚴重關切。由首都哈瓦那大學數學及經濟系學生聯合其他城市（如Las Tunas, Manzanillo, Bayamo, Dillaclara, Santiago等）大專院校學生，在各校內張貼反保守、反社會主義和反卡斯基的標語，並倡組「新自由之光」非法團體。乃因此被冠以「反國家活動」之罪名而遭情治單位的提詢。¹⁶

哈瓦那大學當年曾是古巴共產黨的發祥地，也是卡斯楚鼓吹「七·二六運動」的大本營，而其他各地的大學和高中生也曾在五〇年代末期的革命行動中，對推翻巴蒂斯達政權，發揮過決定性的作用，爾今，以哈瓦那大學為首的學生團體再度展現「反體制」的聯合行動，自必引發古巴政府的倍加警惕而提高當局的危機意識。

註¹³ *Foreign Reports*, Oct. 31, 1991, pp. 4-5.

註¹⁴ *The Latin American Times*, Vol. 10, no. 10 (Jan. 1992), p. 23.

註¹⁵ *The Latin American Times*, Vol. 10, no. 9 (Autumn 1991), p. 22.

註¹⁶ *Foreign Report*, Feb. 21, 1991, p. 1; Oct. 31, 1991, p. 6.

四、經濟危機

社會主義政經制度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或較資本主義制度為優，則不能取決於響亮的政治口號或欽定的意識形態，而是要由長期實踐的結果來證實。因為實踐的結果已經顯示：社會主義在蘇聯及東歐集團完全失敗，而古巴以蘇為師的社會主義怎能例外，尤其在經濟方面，其失敗的情形遠較蘇聯及東歐各國為甚。

經濟既是社會的下層建築，若下層建築問題重重，則一切的上層建築必然搖搖欲墜而危機四伏。

在東歐巨變及蘇聯瓦解以及「經互會」解組後，古巴的整體經濟正面臨破產的邊緣，如能源危機、外匯短缺、消費品供應不足，以及因此而衍生之種種相關難題：交通癱瘓、部份產業停工、失業人口增加、實施嚴格配售制度……等，已將古巴社會推入所謂「平時緊急狀態」和「零選擇」的困境。今就古巴經濟面所出現的各項危機析陳於後：

(一)能源危機：古巴能源幾全部仰賴石油，而石油的百分之九十五須仰仗進口（古巴自身每年石油產量僅及八十萬噸），即全年須自蘇進口石油一、三〇〇萬噸（此為一九八九年之進口基準）。惟自一九九〇年起，蘇聯之供油量逐年下降——一九九〇年為一、〇〇〇萬噸，次年減為八六〇萬噸，而今年（一九九二）之供油量可能僅及六〇〇萬噸，尚不及三年前之半數，¹⁷由此可知古巴能源困境之嚴峻程度了。

面對嚴峻的能源危機，古共當局只有採取節約與開源的應急措施。在節約方面，如關閉部份耗能較高的企業、實施油品配售制、限制用電、減少交通工具數量及班次，以及大量以腳踏車為代步之工具。¹⁸在開源方面則向拉美的產油國委內瑞拉、墨西哥和厄瓜多爾等尋求油源。雖然各國欣然允諾充分供應，但須按國際市價以硬貨幣支付。¹⁹這對外匯極度缺乏的古巴而言，等於一記重創。

(二)外匯短缺：外匯嚴重短缺是顯示經濟危機的另一信號。造成外匯奇缺的主要因素有四：「經互會」解體的影響；²⁰外

¹⁷ FBIS/LAT 92-017, Jan. 27, 1992, p. 7.

¹⁸ 為了節省能源，古巴被迫關閉部份煉油及煉鋁廠，油電供應量減少，三〇%或減半，火車及公車班次均酌量減少或將站距拉長，哈瓦那的計程車減少二百輛，司機則被遣往農村就業。見 FBIS/LAT 90-197, Oct. 11, 1990, pp. 4-6, Foreign Report, Fed. 21, 1991, p. 3.

¹⁹ 卡斯楚曾於一九九一年分訪委、墨、厄三國，請求提供石油源，該三國均答應充分供應，惟拒絕按「聖荷西協議」條件給予優惠價格。請參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Nov. 7, 1991, p. 6;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 25, 1991, p. 3.

²⁰ 「經互會」解體雖不是形成外匯短缺之直接因素，但却是一個極為嚴重的間接因素。即在該組織尚未解體前，古巴既可以「對等貿易」或「易貨交易」方式取得所需之重要物資，如石油、食品、機械、紡織品等，而勿須支付硬貨幣，且可將進口石油轉銷於國際市場，賺取三至五億美元，以充進口之用。而今則一切進口商品皆須以外匯支付之，同時，外銷市場尚在開拓階段，這對外匯之取得非常不利。請參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Oct. 24, 1991, p. 3.

銷商品缺乏彈性；②外援銳減；③外債積欠過高等。④外匯短絀的結果則是進口額急劇下降，因而導致嚴重的供需失調與相關經濟活動之連鎖反應。如因能源不繼、原材料供應不足、零組件極度短缺……等，迫使部份企業停工減產，運銷受阻，以及市場供需失衡等現象。致古巴整體經濟成長自一九九〇年第二季度以後呈逐年下滑趨勢，一九九一年之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八%，而一九九二年之GDP可能滑落一〇%。

(三)消費品供應不足：今日古巴人民在解決基本民生問題方面，已瀕臨嚴峻的供需失調局面，因此必須全面實施限量配售措施。人民爲了取得些許之日用品必需品，被迫鎮日排隊挨號，至終可能因貨源不足以致空手而歸。⑤古巴人民爲此而怨聲載道，不僅對每下愈況的經濟現狀表示不滿，甚至對社會主義制度也表大失所望。

卡斯楚爲了平息民憤及紓解民怨，只好將一切責任歸諸於蘇聯的離棄社會主義和背信（未能依約供貨）、美國的貿易禁運，以及資本主義的重重包圍。⑥

經濟危機是古巴當前危機群中最大、最嚴重而又緊迫的危機，因爲其他危機均直接間接與經濟問題有關，或因經濟危機升高而增強，或因經濟危機紓緩而減弱，甚至會因經濟問題逐步解決而逐漸降溫。反之，若經濟問題長期內不能解決或無法獲得起碼的改善，則古共政權將必因此而招致覆亡，所以古巴政府現正卯足全力設法處理此一嚴重的經濟危機。⑦

五、危機意識與民族主義

註21 古巴外銷商品結構缺乏彈性，頗難適時加以調整，其主要出口品爲蔗糖、柑桔、菸草、鎳錠等，在「經互會」解組後，不僅新市場難以拓展，價格競爭也居弱勢，自必影響出口創匯。

註22 世人盡知，在一九九〇年以前，古巴每年可自蘇聯獲得三十至五十億美元之經援。同時，東歐各國也對古提供相當數目之援助。上述兩項外援均先後在一九九〇年前後終止。另古巴可自某些西方國家如日本、加拿大、西班牙等，取得少數之貸款或經援外，很難自國際多邊金融機構獲得資金或短期周轉貸款。

註23 目前，古巴除了積欠東歐集團（包括蘇聯）外債八五〇億盧布之外，尚欠西方外債七〇億美元，須按時付息。見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8 ~14, 1991, pp. 10~11.

註24 目前，所有日用品均被納入限額配售範圍內，如規定每人每月之食米配額爲二公斤、食糖一·八公斤、肉類三〇〇公克……襯衣褲每人每年各一件，鞋每年一雙……等。關於配售之詳情，請參 *Francisco de Andres, "Cuba Reinvents the 'Salsa' Without Season," ABC, Madrid, May 7, 1991.*

註25 關於卡斯楚對蘇、美、資本主義的指控，請參卡氏在古共「四大」的演講，載於 *FBI'S LA 7-97-199-S, Oct. 15, 1991, pp. 3~26.*

註26 關於古巴如何處理其經濟危機，請參劉天均，「東歐變革後的古巴政局」及「經互會解體對古巴經濟的衝擊」，分見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的，問題與研究，民國八十年四月號，頁五八~六九；八十一年一月號，頁四〇~五〇。

從拉美文化與古巴歷史兩個角度觀之，拉美地區沒有適合共產主義生存發展的空間，但在拉美社會基層深處潛蘊著一股主張實現「人道社會主義」的強烈願望，因為該地自殖民時代以來一直存在著貧富不均和以強凌弱的社會現象。惟此一現象的存在並非意味人民有實行共產主義的要求，所以共產主義始終沒有在拉美地區找到可供推銷的寬廣市場（包括古巴在內），雖然拉美各國都有一個或多個形形色色的共黨組織。

再從卡斯楚個人政治理念與正統馬列主義理論兩個角度觀之，卡斯楚算不上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徒，充其量只是一個「投俄降共」的民族主義分子，或是一個披著馬列主義外衣而內懷人道社會主義理想的民族主義愛國者。²⁷他之所以必須（或不得不）宣示信奉馬列主義並一面倒向蘇聯共黨集團的懷抱、抄襲蘇聯的政經制度和深深捲入「經互會」組織等，實乃基於當時（六〇及七〇年代）的國際環境、古巴所處的地理位置、民族生存與國家安全的雙重利益，以及卡斯楚個人政治野心、投機心理與求生本能等多重因素，而走上這條一去不復返的社會主義道路。²⁸

而今之國際局勢不變，東西方對抗不再，冷戰業已消失，古巴也隨之淪為西半球的共產孤兒。它既不再有蘇共集團為其撐腰，也不復享有「經互會」時期的經貿利益，²⁹尤有進者，更難期美國會在短期內與之改善關係或解除三十多年的貿易禁運，以利紓解其瀕臨破產邊緣的經濟。

值此「內憂外困」之際，卡斯楚深知古巴人民（其中以約佔總人口百分之四十的中生代為主）對馬列主義教條既冷漠又抗拒，對所謂「社會主義革命路線」及其諸般措施（除社會福利政策外），或表徬徨，或表失望，惟對維護古巴的國家獨立與民族尊嚴則多不甘後人，雖然自一九八〇年「逃亡潮」以來因不滿古共政權而亡命海外的人士多達數十餘萬。³⁰因此，為了鞏固政權及應付四伏的危機，卡斯楚便再度祭起民族主義的大旗，以喚醒國人的愛國情操與民族大義，並巧妙的將民族主

註27 關於卡斯楚早期的政治理念與信仰的心路歷程，以及嗣後何以採行社會主義政經制度並將古巴推向共產主義集團之來龍去脈，請參劉天均，「卡斯楚主義：共產主義的末流」，問題與研究，民國七十二年七月號，頁八一—九五。

註28 卡斯楚當年為何走向社會主義道路及投向蘇聯的懷抱，請參 Alan H. Luxemburg, "Did Eisenhower Push Castro into the Arms of the Soviet?"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Spring 1988, pp. 37-52。

註29 關於古巴自一九七二年正式加入「經互會」後所得之經貿利益，請參劉天均，「經互會解體對古巴經濟的衝擊」，見前揭文。

註30 自卡斯楚於一九五九年春建立政權迄今，曾發生過四次大規模之逃亡潮。第一次發生於一九五九年前後，多為富有人士，約二十萬人；第二次在一九六五年後，卡斯楚允許異議人士自由離境，嗣後七至八年間共有三十萬人獲准移居美國；第三次為一九八〇年的「馬里埃逃亡潮」，在短短的數月之內，約十二萬六千的「新社會渣滓」（受刑人、智障、社會邊緣人、異議人士……等）和不满分子逃抵美國。最近因東歐巨變及古巴經濟困難，又有一些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潛逃或經合法途徑一去不返，自一九九〇年至今，約三至四萬人離開了古巴。見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5-11, 1991, p. 8; *The Economist*, Dec. 14, 1991, p. 43。

義與社會主義連結在一起，^②將國家安全與政權危機之間畫上等號，再進而將「攘外」與「安內」視爲一事的兩面，甚至把卡斯楚個人的安危與古巴「革命」大業的成敗合而爲一，這是卡某在其統治藝術中善於運用辯證邏輯的高明之處。

前已言之，古共政權以美國的貿易禁運爲藉口，將國內的經濟困境歸罪於美帝，並利用「美帝國主義」侵略威脅這一王牌，作爲保衛祖國和鎮壓異己的護身符，或以此作爲反對大幅度改革的口實。^③

卡斯楚現正利用古巴人民的愛國情感和美古近代史上所沉積下來的民族情結，以及反帝反殖的「馬蒂精神」，將民族主義當作一種可資整合民心、凝聚民力、激勵全民士氣、應付危機的政治工具。然而這項統治工具最終能否發揮卡斯楚所期望之「保衛社會主義祖國」和應付危機的功用，尚須視古巴當前所遭遇的各項難題之能否獲得適時、合理及起碼的解決；如人民的基本生活問題、人權問題、政經改革問題，以及改善與美關係問題等。^④換言之，民族主義雖是應付危機時可以動用的一張王牌，但有其極限性，它必須在國家安全面臨外來威脅及民族尊嚴遭到外來挑戰時，才會真正有利於卡斯楚的統治邏輯。不過，這也正是美國當局所小心避免的陷阱，一直希望在不刺激古巴人民民族情感的前提下，循「和平」的途徑讓卡斯楚「自願」的移轉其政權——這是另一種方式的和平演變。

六、結 論

今日的古巴，猶如加勒比海上的一葉扁舟，在狂風暴雨和驚濤駭浪中迷失了方向，正在爲挽救自身的性命而與惡劣的天候相搏鬥，但能否履險如夷或遭到滅頂之禍，不僅須靠命運，尤須靠舵手的經驗與技術能否經得起考驗，以及他與水手們是否合作無間。目前，在這方面尚無任何不祥的兆頭顯示，即卡斯楚與黨、政、軍三股主力之間尚無任何裂痕或出現政見紛歧及權力鬥爭的場面（除了一九八九年秋所發生的奧喬阿整肅事件），進而動搖卡斯楚的專政基礎，形成另一種危機——領導危

註① 卡斯楚於一九九〇年的「七、二六運動」大會上稱：古巴爲了民族尊嚴、獨立與自由，必須堅持實行社會主義和嚴防資本主義的侵襲。見 *FBI'S LAT-90-144, July 26, 1990, p.4.*

註② 卡斯楚以古巴距離美國太近，只有九十英里一衣帶水之隔，故爲了國家安全，不可貿然進行改革，以免自亂陣腳，爲敵人所乘而導致動亂。見 "The Graying of a Revolution," *US News & World Report, Jan. 9, 1989.*

註③ 在美古關係正常化方面，拉美諸國領袖多主張彼此退讓，以改善現狀。惟美國對此看法頗爲紛歧：主政之共和黨主張以強硬手段迫使古巴在人權、改革、開放等方面作出正面反應，但不擬採取軍事行動；民主黨人士及其溫和派則認爲宜採不干涉主義，誘使卡斯楚進行改革開放，在適當時機與之關係正常化。而古巴則乘機向外宣稱：改革開放須在美國先行改變其對古政策下，始可循序漸進。請參 *Gillian Gunn, "Will Castro Fall?" Foreign Policy, NO. 79, Summer 1990, pp. 132-150; Latin American Economy and Business, Oct. 1991, p. 11.*

機。

因此，吾人可以審慎的預測，若古巴內部尚能維持相當程度之團結而不致自亂陣脚，若美國尚能自行克制而不以當年對付格瑞納達和巴拿馬的方式去對付古巴，^{②4}若拉美各國仍願基於「血濃於水」的文化情感而繼續關注古巴的政局，縱令古巴今日存在著前述之各項危機，仍不致發生「羅馬尼亞事件」及「蘇東波」例案，或演出納吉布拉的下場。

不過，就古共「四大」後的政策走向和卡斯楚個人的意圖觀之，古共政權處理危機的手段不是對西方與拉美諸國領袖的建議照單全收，而是有選擇的採取「中共模式」——建立有「古巴特色的社會主義」。

*

*

*

註②4

布希總統於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七日曾就改善與古關係，提出如下之七點原則：舉行自由公正之選舉、承認反對黨派、與反對力量進行接觸、國際監督選舉、准許聯合國調查人權狀況、釋放政治犯與停止支持左傾力量等。見 Susan K. Purcell, *op. cit.*, pp.143~144.

airiti